

县域小额信贷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崔巧琳, 王晨翔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以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为例,从农民收入、家庭收入及城市创业等视角考察了小额信贷的共同富裕效应。结果表明:①在农民收入方面,小额信贷能够提高县域农民纯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的概率,有助于农村脱贫攻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在家庭收入方面,小额信贷能对家庭收入中土地出租收入起正向作用,表明小额信贷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③在创业方面,小额信贷能够促进城市创业,有助于发挥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将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小额信贷方面的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 小额信贷;“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3)7—0141—11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带领人民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刘培林等,2021)。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围绕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及收入差距(蒋永穆和谢强,2021)。目前,诸多文献从基本经济制度(卫兴华和张宇,2013;程恩富和张建刚,2013)、收入分配制度(陈宗胜,2018)、民营经济(魏杰和施成杰,2014)、共享经济(刘凤义,2016)、数字经济(周雪松,2021)、乡村振兴(李实等,2021)等角度研究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当前,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土地流转(Keswell and Carter, 2014;黄祖辉和杜语,2022)、公共转移支付(解垠,2017;李晗和陆迁,2022;Balboni et al, 2022)、公共服务(杨春学和朱玲,2014;朱玲和何伟,2022)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在传统金融对此问题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总体较少。Beck等(2000)研究了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农村地区存在的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董晓林和徐虹,2012)。为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金融市场准入现状,普惠金融应运而生,而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的其中一种工具,中国早在1993年便引入了小额信贷项目,但其优良的下沉性、灵活性及门槛相对较低等优势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被忽视,直至2008年开始小额信贷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小额信贷从引进之初就被应用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兼具普惠性和营利性两大特征。一方面,小额信贷能够发挥其普惠性特征,促进农民增收、家庭增收和增进创业;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可能会由于其营利性特征导致马太效应,抑制农民增收、家庭增收和创业。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2000—2016年县级层面数据研究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其次,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研究小额信贷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后,基于2000—2016年城市层面的宏观数据研究小额信贷对城市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收入、家庭收入和创业三个方面,小额信贷均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在于:第一,对小额信贷理论机制进行分析,补充完善了小额信贷在解决“三农”核心问题、促进创业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第三,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认识小额信贷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政府小额信贷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 2023-03-30

作者简介: 崔巧琳,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王晨翔,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证券投资。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机制分析

(一)文献综述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普惠金融是能够使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广泛、无障碍地享受金融服务的一种金融体系。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指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目前,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的构建,如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角度构建了普惠金融的8个指标;二是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国内外各大学者研究了金融服务供给(Beck et al, 2007)、金融需求主体(Swamy, 2014)、社会环境因素(Arora, 2012)等方面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三是普惠金融的效应研究,许多文献分别从经济增长(李建军等, 2020)、就业(张号栋等⁶¹⁻⁶², 2017;李德山等, 2021)、扶贫(尹志超和张栋浩, 2020)、数字普惠金融(张勋等, 2018;马俊, 2022;孙芳城等, 2022)等角度揭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影响机制及产生的作用,本文重点关注普惠金融与创业、“三农问题”之间的关系。

普惠金融更加强调服务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因此更加有利于创业。资金作为创业的重要投入要素,是制约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Nykqvist, 2010),因此创业对金融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由于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使得创业活动大大减少(Claessen and Perotti, 2007;陈刚, 2015)。而普惠金融有助于改善金融排斥现象(Allen et al, 2016),李建军和李俊成(2020)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创业。一方面,通过直接为创业者提供信贷支持促进创业;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帮助借款者提高个人技能素质和人力资本,最终促进创业。

普惠金融对解决“三农问题”起积极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小额信贷的探索形成了现代普惠金融的雏形(刘桂平, 2021)。其中,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国(Yunus, 1998)和印度(Burgess et al, 2005)均起到了减少农村贫困的作用。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普惠金融开始被世界银行、国际金融组织等机构大力推广,使得普惠金融理念逐渐被更多国家接受,其内涵也不断得到丰富。在中国,普惠金融于广大农村地区快速发展,李建军和韩珣(2019)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双重差分法(DID)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了普惠金融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董丽霞(2022)则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出发,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积累,并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基于上述分析,普惠金融的文献主要集聚于评价指标构建、影响机制研究及效应研究三个方面。但在普惠金融的效应研究文献中,关于小额信贷的效应研究的文献却寥寥无几。因此,本文拟补充完善小额信贷的效应研究,创新性地从机理上厘清小额信贷对创业、“三农问题”的作用,以揭示小额信贷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共同富裕起到的积极影响。

(二)理论机制分析

1. 小额信贷的普惠性

小额信贷发挥其普惠性特征,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家庭增收和增进创业。首先,农民增收方面,低收入、贫困的农民可以凭借较低的条件甚至无条件申请到小额信贷,从短期来看,小额信贷能够增加农民当下收入,有助于解决当下资金缺乏所带来的基本消费困难等问题;从长期来看,小额信贷有助于缓解资金缺乏导致的教育困难等问题,从而增加未来收入。其次,家庭增收方面,家庭以低成本获得小额信贷以后,可以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增加居民金融市场的参与经验(张号栋等, 2017)⁶⁹⁻⁷⁰;小额信贷也可以用于家庭成员智力等水平的提升(谔建文, 2018),从本质上帮助家庭实现资本积累。最后,创业增进方面,小额信贷对创业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小额信贷可以直接为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提供贷款支持,从而促进创业;路径二是小额信贷被借款者应用于提升个人技能素质,从而激发借款者创业,间接促进创业。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小额信贷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假设:

小额信贷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H1);

小额信贷能够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共同富裕(H2);

小额信贷能够增进创业,促进共同富裕(H3)。

2. 小额信贷的营利性

小额信贷可能由于其营利性特征导致马太效应,抑制农民增收、家庭增收和创业。根据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政府采用利率、汇率等金融工具对金融活动过分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目前,除了正规银行体系能够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非传统金融机构也被允许存在和发展,同样可以提供小额信贷业务。但不同于正规银行体系,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政策存在金融分层监管、融资杠杆监管及与经营挂钩的升级机制三方面的特殊性(张龙耀等,2016)。在这三方面的特殊金融监管政策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面临实现经营业绩与完成监管指标不兼容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满足经营性指标。首先,在农民增收方面,小额贷款公司考虑到农民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低收入、贫困的农民不能够以低成本,甚至不能按期偿还小额信贷的农民需要承担较高的违约风险,从而导致农民收入不增反降。其次,在家庭增收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在考虑营利性指标的情况下,或许要求加家庭以宅基地、住房等现有财富为担保条件申请贷款,违约时将没收或拍卖宅基地、住房,从而抑制家庭收入增加、财富增长。最后,在创业增进方面,小额贷款考虑到创业活动本身较高的失败率,为了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率,满足经营性指标,不愿意或将以更高的利率贷款给创业者,不利于激发创业者参与创业。因此,小额信贷在上述情况下存在较强的金融排斥现象,从而抑制农民增收、家庭增收及创业,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小额信贷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反向假设:

小额信贷会抑制农民收入,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H4);

小额信贷会抑制家庭收入,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H5);

小额信贷会抑制创业,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H6)。

三、特征性事实分析

(一) 小额信贷业务特征性事实分析

小额信贷业务发展主要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和平稳发展期两个阶段。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2010—2014年为小额信贷业务高速发展期,该阶段小额贷款余额快速爬升,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5%及以上,年均增长率为50.70%,并且于2011年达增长率高点,为98.21%。2015—2021年为小额信贷业务平稳发展期,该阶段小额贷款余额总量保持稳定,呈小幅波动态势,年均增长率为0.06%,业务扩张速度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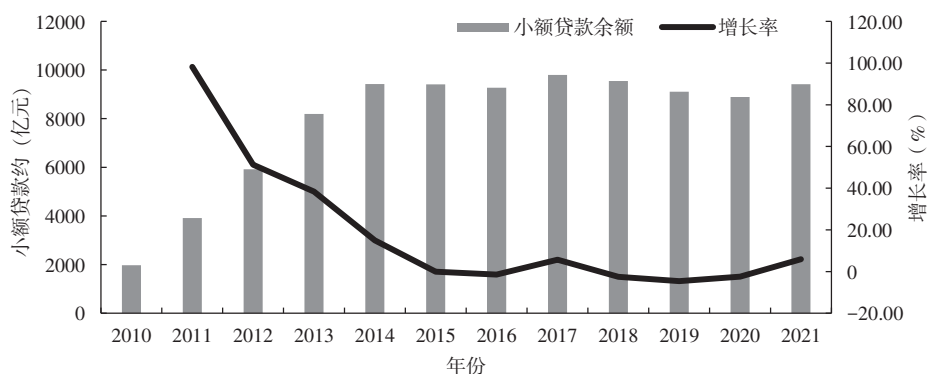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小额贷款余额随年份变化图

不同年份不同省(市、自治区)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图2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其反映了2014年、2019年小额信贷余额地区分布情况,2014年江苏、重庆、广东小额信贷发展较为突出,其中江苏小额贷款余额位居全国第一。经过五年的发展,部分地区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程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原位居首位的江苏省贷款余额明显下降,重庆超过江苏省成为全国第一。此外,西藏、青海、宁夏等多个西部地区小额信贷业务长期以来相比其他地区较为靠后。

(二) 县域发展特征性事实分析

1.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1986年,中国开始了最大规模的减贫运动,共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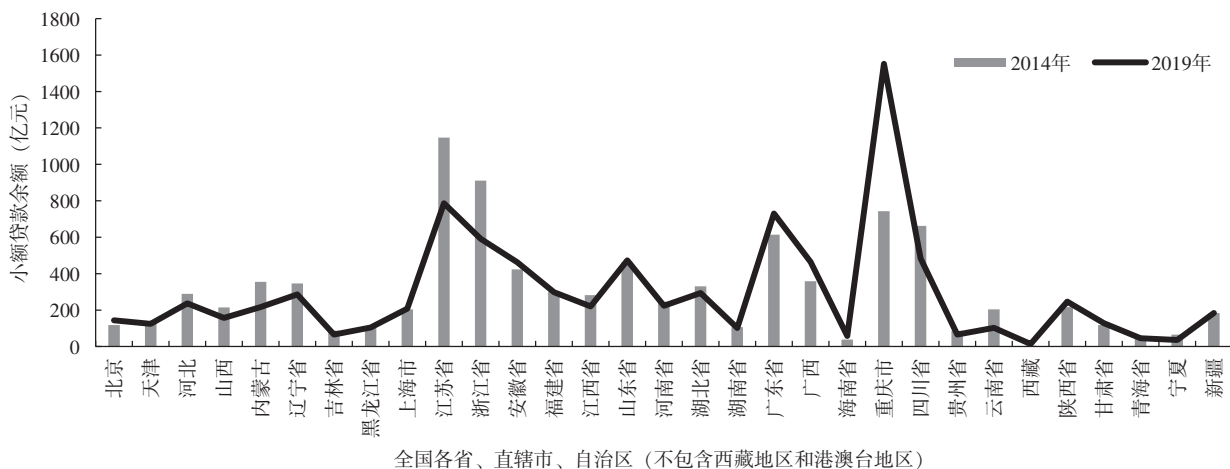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9年小额贷款余额地区分布图

县。201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和《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重新公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在经过了三十多年浩浩荡荡的脱贫攻坚,2020年中国实现551万贫困人口脱贫,52个贫困县摘帽,其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减少323万人,中部地区贫困人口减少181万人,东部地区贫困人口减少47万人。2020年11月,贵州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志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完成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如图3所示,其反映了2010—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总体来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分阶段来看,2011—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高,年增长率均超过10%。2015—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略微下降,其中,2020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较明显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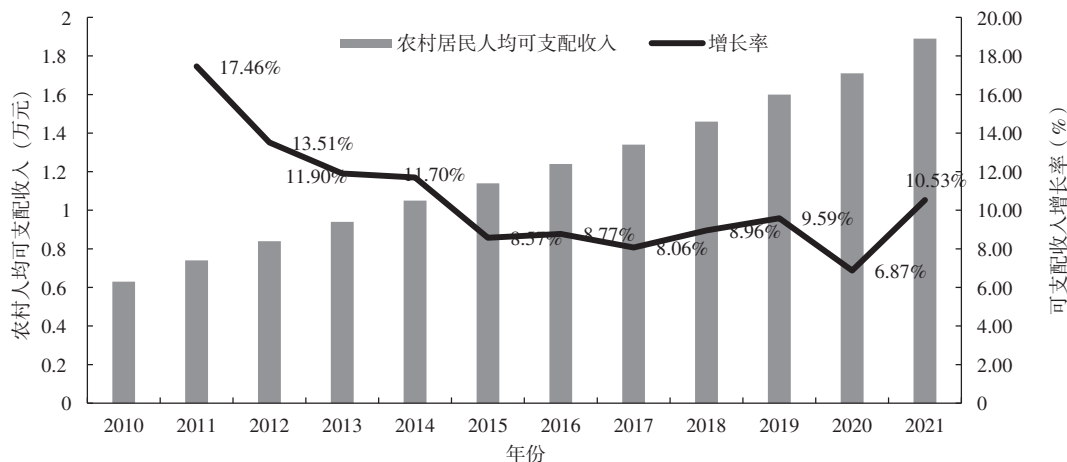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年份变化图

四、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中国出台了小额贷款业务公司成立的流程及相应要求等文件,小额贷款公司受到外部严格的政策监管,由此本文设置了如下计量模型:

$$y_{jt} = \beta_0 + \beta_1 num_{jt} + \beta_2 X_{jt} + \gamma_t + \mu_j + \varepsilon_{jt} \quad (1)$$

其中:下标 j 和 t 为第 t 年的第 j 个县域;被解释变量 y_{jt} 选择 $countyincome_{jt}$ 和 $poverty_{jt}$ 两个指标,其中 $countyincome_{jt}$

为第 t 年第 j 个县域的农民纯收入; $poverty_{jt}$ 为第 t 年第 j 个县域是否为贫困县,如果是贫困县取 1,反之取 0;解释变量 num_{jt} 为第 t 年第 j 个县域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X_{jt} 是反映县域特征的控制变量; γ 为固定时间; μ 为固定地区、个体; ε 为随机扰动项; β_0 为常数项系数; β_1 为自变量系数; β_2 为控制变量系数。

$$houseincome_k = \beta_3 + \beta_4 num_k + \beta_5 X_k + \mu_k + \varepsilon_k \tag{2}$$

其中:下标 k 为第 k 个家庭;解释变量 $houseincome_k$ 为家庭各项收入指标; num_k 为第 k 个家庭所在的省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X_k 为反映家庭成员能力特征的控制变量; β_3 为常数项系数; β_4 为自变量系数; β_5 为控制变量系数。

$$ie_{it} = \beta_6 + \beta_7 num_{it} + \beta_8 X_{it} + \gamm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tag{3}$$

其中:下标 i 和 t 为第 t 年的第 i 个城市;解释变量 ie_{it} 为第 t 年第 i 个城市新创企业数量;解释变量 num_{it} 为第 t 年第 i 个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X_{it} 为反映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 γ 为固定时间; β_6 为常数项系数; β_7 为自变量系数; β_8 为控制变量系数。

本文将重点关注 β_1 、 β_4 和 β_7 系数值。

(二) 指标选取、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 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说明

刘培林等(2021)在人群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多个方面设想了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贫困家庭收入保障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基于此,本文实证分析选取农民纯收入($countyincome$)、“是否是贫困县”($poverty$)、家庭收入($houseincome$)及城市创业(ie)为因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选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排名($rank$)作为因变量。

本文县域控制变量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ercapitagdp$)、第二产业增加值($secondadd$)、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ci)、地区面积($area$)、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student$)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bn),并取对数处理,其中,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由县域数据加总获得。家庭控制变量有家庭成员人数($familypeople$)、理解能力($ability$)、衣服整洁程度($health$)、外貌($clothes$)、普通话熟练程度($mandarin$)、智力水平($intelligence$)、语言表达能力($expression$),均按 1~7 等级进行填列,1 表示很差,7 表示很好。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控制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区县样本总量为 48569,其中小额贷款公司数量(num)最大值为 67,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3.021,离散程度相对较小。农民纯收入($countyincome$)、家庭总收入($houseincome_{12}$)的标准差分别为 2025.172 及 42721.750,表明数据离散程度均较大,县域农民与农民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城市新创企业数量(ie)数据标准差为 3864,表明城市之间创业活动积极程度相差较大。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解释	变量来源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	新创企业数量*	各地信息统计网	6153	244.119	2025.172	1.000	76274.000
$countyincome$	农民纯收入	县域统计年鉴;各地信息统计网	26028	5330.000	3864.000	371.000	31849.000
$poverty$	是否是贫困县(是=1)	1994 年、2001 年、2011 年及 2014 年贫困县名单;2016 年脱贫县名单	48569	0.233	0.423	0.000	1.000
num	小额贷款公司数量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48569	1.174	3.021	0.000	67.000
$\lnsecondadd$	第二产业增加值(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9657	12.070	1.698	0.000	17.880
$\lnpercapita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4750	9.515	1.002	6.439	14.870
$\lnarea$	地区面积(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8298	7.577	1.125	2.303	12.250
$\lnstudent$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6059	9.781	1.086	2.890	12.320
$\lnfci$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0835	12.500	1.558	5.302	17.880
$\lnbn$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对数)	县域统计年鉴	35327	6.651	0.968	1.386	9.523
$houseincome_{12}$	过去 12 个月总收入	CFPS(2016 年)	6261	42721.750	143338.400	0	8336000
$houseincome_{work}$	打工收入	CFPS(2016 年)	3288	28940.560	26367.190	0	400000
$houseincome_{hr}$	房屋出租收入	CFPS(2016 年)	107	18174.750	35003.530	3	290000
$houseincome_{lr}$	土地出租收入	CFPS(2016 年)	879	1830.871	4562.909	0	75000
$familypeople$	家庭成员人数	CFPS(2016 年)	6333	4.126	2.013	1	19
$ability$	理解能力	CFPS(2016 年)	6338	5.531	1.208	1	7
$health$	健康状况	CFPS(2016 年)	6338	5.531	1.201	1	7
$clothes$	衣服整洁程度	CFPS(2016 年)	6176	5.428	1.240	1	7
$appearance$	外貌	CFPS(2016 年)	6176	5.386	1.239	1	7

续表

变量	变量解释	变量来源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mandarin</i>	普通话熟练程度	CFPS(2016年)	4987	4.530	1.894	1	7
<i>intelligence</i>	智力水平	CFPS(2016年)	6338	5.431	1.216	1	7
<i>expression</i>	语言表达能力	CFPS(2016年)	6338	5.337	1.294	1	7

注:上标*表示城市层面的数据由县域数据加总获得。

五、实证分析

(一)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1. 小额信贷对县域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小额信贷对县域农民纯收入的增收效应见表2,控制了县域经济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产业规模、地区规模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量以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县域农民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每增加1家,县域农民纯收入增加202.870元,该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此回归结果符合假设1,即小额信贷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农村脱贫攻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考虑到县域农民纯收入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别,本文将全国县级行政区划分为东北、东部、西部和中部4个部分,从而分别考察小额贷款公司对县域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3,在控制了县域经济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产业规模、地区规模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量情况下,东北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中部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县域农民纯收入均呈正相关关系,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显著增加县域农民纯收入。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1个,县域农民纯收入增加318.440元,该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对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1个,县域农民纯收入分别增加172.1351元、114.291元及80.598元,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的增收效应相比其他三个地区较优。分地区情况下,回归结果符合假设1,不同地区小额信贷均能够增加县域农民纯收入,有助于各地农村脱贫攻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表2 小额信贷对县域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变量	(1)	(2)
	<i>countyincome</i>	<i>countyincome</i>
<i>num</i>	160.774*** (4.911)	202.870*** (6.839)
<i>lnsecondadd</i>		-473.844*** (49.136)
<i>lnpercapitagdp</i>		1347.907*** (80.075)
<i>lnarea</i>		363.199*** (133.661)
<i>lnstudent</i>		-315.295*** (42.363)
<i>lnfci</i>		-319.608*** (24.358)
<i>lnbn</i>		-467.893*** (42.502)
常数项	2166.651*** (36.121)	2290.760* (1184.121)
样本量	26028	19666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adj. R^2	0.845	0.856

注:*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表3 不同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

变量	(东北)	(东部)	(西部)	(中部)
	<i>countyincome</i>	<i>countyincome</i>	<i>countyincome</i>	<i>countyincome</i>
<i>num</i>	80.598*** (16.725)	318.440*** (15.901)	114.291*** (8.073)	172.135*** (12.844)
常数项	6237.638* (3544.900)	-50014.153*** (3715.730)	410.204 (1227.671)	16072.258*** (2916.397)
样本量	1882	5671	6928	5185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adj. R^2	0.897	0.875	0.882	0.899

注:*表示10%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2. 小额信贷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小额贷款公司对贫困县影响的具体结果见表4,小额贷款公司能够对贫困县脱贫起到正向的作用,小额贷款公司越多,越有利于降低成为贫困县的概率。表5报告了表4列(1)、列(2)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在控制了经济规模、财政支出规模、产业规模、地区规模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量的基础上,胜算比(*odds*)变为原来的0.629倍,表明成为贫困县的概率降低0.271倍。该结果符合假设1,小额信贷能够减缓贫困,有助于贫困县脱贫“摘帽”,促进共同富裕。

我国贫困县更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

疆、内蒙古 12 个省(市、自治区),考虑到不同地区贫困程度的不一致性,本文分别考察东北、东部、西部和中部 4 个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对贫困县脱贫的影响。表 6 反映了不同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对贫困县影响的具体结果,小额信贷对贫困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北地区 and 东部地区,小额信贷不利于实现脱贫。在中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抑制贫困。通过表 7 的边际效应分析,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个单位,成为贫困县的概率增加 1.073 倍;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个单位,成为贫困县的概率增加至原来的 2.027 倍;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个,成为贫困县的概率降低至原来的 0.401 倍;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个,成为贫困县的概率降低至原来的 0.636 倍。因此,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实证结果符合假设 4,小额信贷不利于贫困县脱贫“摘帽”。而中西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符合假设 1,小额信贷能够减缓贫困,有助于贫困县脱贫“摘帽”,促进共同富裕。

表 4 小额贷款公司对贫困县的影响

变量	(1)	(2)
	<i>poverty</i>	<i>poverty</i>
<i>num</i>	-0.284*** (0.026)	-0.315*** (0.043)
<i>lnsecondadd</i>		0.297 (0.249)
<i>lnpercapitagdp</i>		-2.195*** (0.398)
<i>lnarea</i>		1.728** (0.774)
<i>lnstudent</i>		1.056*** (0.183)
<i>lnfci</i>		0.481*** (0.123)
<i>lnbn</i>		0.044 (0.207)
样本量	8041	3791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表 5 小额贷款公司边际扶贫效应

变量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95% conf. interval]		对应回归
<i>num</i>	0.629	0.148	-19.70	0.000	0.601	0.659	表 4 列(1)
<i>num</i>	0.628	0.026	-11.24	0.000	0.580	0.681	表 4 列(2)

表 6 不同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对贫困县的影响

变量	(东北)	(东部)	(西部)	(中部)
	<i>poverty</i>	<i>poverty</i>	<i>poverty</i>	<i>poverty</i>
<i>num</i>	6.837*** (1.767)	0.555*** (0.175)	-0.370*** (0.050)	-0.616** (0.272)
样本量	270	426	2481	614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表 7 分地区小额贷款公司边际扶贫效应

变量	Odds ratio	std. err.	z	P> z	[95% conf. interval]		对应地区
<i>num</i>	1.073	0.238	0.320	0.752	0.695	1.656	表 6(东北)
<i>num</i>	2.027	0.314	4.560	0.000	1.496	2.747	表 6(东部)
<i>num</i>	0.636	0.033	-8.750	0.000	0.575	0.704	表 6(西部)
<i>num</i>	0.401	0.080	-4.570	0.000	0.271	0.594	表 6(中部)

(二)小额信贷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小额信贷对家庭的增收效应见表 8,在控制家庭成员人数、理解能力、衣服整洁程度、外貌、普通话熟练程度、智力水平、语言表达能力等变量的情况下,列(1)~列(4)分别反映了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家庭过去一年总收入、打工收入、租房收入、土地出租收入之间的关系。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与家庭过去一年总收入、打工收入、租房收入均呈负相关关系,该结果符合假设 5,说明小额信贷会对按劳分配获得的工资收入及出租房屋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从土地出租收入角度来看,小额信贷与家庭土地出租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家,出租土地收入增收 3.835 元。在我国,土地出租常常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它属于农村家庭独有的经营性收入。小额信贷对出租土地收入的实证结果符合假设 2,表明小额信贷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表 8 小额贷款公司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i>houseincome₁₂</i>	<i>houseincome_{work}</i>	<i>houseincome_{hr}</i>	<i>houseincome_{lr}</i>
<i>num</i>	-92.180*** (8.338)	-21.030*** (3.096)	-31.960*** (6.047)	3.835*** (0.848)
<i>familypeople</i>	5249.000*** (745.400)	4229.000*** (244.500)	1537.000** (636.600)	149.700** (70.750)

续表

变量	(1)	(2)	(3)	(4)
	$houseincome_{12}$	$houseincome_{work}$	$houseincome_{hr}$	$houseincome_{lr}$
<i>ability</i>	3122.000(2476.000)	1433.000*(791.700)	-3122.000(2519.000)	-7.309(240.700)
<i>health</i>	1454.000(2594.000)	229.900(860.300)	-2101.000(2986.000)	96.630(238.800)
<i>clothes</i>	2115.000(2781.000)	1506.000*(897.300)	453.100(2643.000)	-373.500(278.600)
<i>appearance</i>	96.270(2790.000)	-456.500(890.500)	3034.000(3077.000)	128.500(274.900)
<i>mandarin</i>	6366.000*** (917.200)	494.700*(285.800)	2159.000*** (821.500)	291.800*** (91.170)
<i>intelligence</i>	297.600(2428.000)	358.100(741.400)	-1854.000(2598.000)	85.990(242.800)
<i>expression</i>	704.500(1959.000)	-1232.000*(628.700)	1908.000(1746.000)	94.950(211.500)
常数项	2037.000(8694.000)	8445.000*** (3055.000)	22837.000*** (7905.000)	-1736.000** (814.700)
样本量	9364	3669	588	1148
固定个体	是	是	是	是
R^2	0.034	0.095	0.073	0.037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三) 小额信贷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新创企业数量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之间的关系见表 9,在控制城市经济规模、产业规模、地区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教育水平及医疗福利水平等相关变量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新创企业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小额贷款公司每增加 1 个,新创企业数量就增加 567.400 个,该结果在 1% 水平上显著。此结果符合本文小额信贷理论假设 3,即小额信贷能够增进创业,有助于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表 9 小额贷款公司对城市创业的影响

变量	(1)	(2)	变量	(1)	(2)
	<i>ie</i>	<i>ie</i>		<i>ie</i>	<i>ie</i>
<i>num</i>	683.300*** (9.281)	567.400*** (10.700)	<i>lnbn</i>		358.600(329.600)
<i>lnsecondadd</i>		3879.000*** (190.900)	常数项	5336.000*** (180.300)	-53612.000*** (5108.000)
<i>lnpercapitagdp</i>		-568.300*** (90.540)	样本量	5780	5780
<i>lnarea</i>		589.800(443.500)	固定时间	是	是
<i>lnstudent</i>		285.100*** (57.330)	固定地区	是	是
<i>lnfci</i>		44.460(34.460)	R^2	0.499	0.542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六、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和可靠,本文从自选择效应、变量替代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处理结果如下所示。

(一) 基于 Heckman 两步法的自选择效应处理结果

1. 创业活动的自选择问题

创业活动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更会有更多的个体、团队等积极创业,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此处采用 Heckman 两步法予以估计:第一步,选择方程,计算得到遗漏变量逆米尔斯比例 λ ;第二步,将第一步回归计算得到 λ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原回归方程中。表 10 反映了小额信贷的创业效应的自选择效应处理结果, λ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样本选择偏差在原方程中不严重,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表 10 小额信贷增进创业的自选择效应处理结果

变量	(1)	(2)	(3)
	<i>ie</i>	<i>select</i>	<i>mills</i>
<i>lnsecondadd</i>		-0.099*(0.039)	
<i>lnpercapitagdp</i>		0.045*** (0.011)	
<i>lnarea</i>		0.052(0.034)	
<i>lnstudent</i>		0.035*** (0.013)	
<i>lnfci</i>		0.006(0.007)	
<i>lnbn</i>		-0.144** (0.056)	
<i>num</i>	7.448*** (1.706)	0.061*** (0.011)	
<i>lambda</i>			551.300(802.700)
常数项	156.4*** (60.690)	2.968*** (0.512)	
样本量	5780	5780	5780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2. 小额贷款公司的自选择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小额贷款公司成立的数量越多、增长速度越快,这可能导致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民、家庭的增收效应的估计结果存在偏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此处依旧采用 Heckman 两步法予以估计。结果见表 11, λ 显著,说明原回归中存在自选择问题,需要使用样本选择模型进行缓解,因此使用 Heckman 两步法是有必要的。根据下表的回归结果,两步法下所得的回归结果均与之前的一致,即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越多,县域农民纯收入越高,家庭收入中土地出租收入越高,说明上述结论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二)以“rank”替代因变量的再检验

在过去长达三十多年得减贫运动中,贫困县选取指标除了以农民纯收入作为评判标准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是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采用衡量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大小的“rank”变量(取值为 1,2,3,…)替代原收入变量从而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其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越大,rank 数值越大。结果见表 12,将“rank”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后,其结果和上文结果保持一致,当小额信贷数量越多,rank 越大,县域人均生产总值越大,即小额信贷能够对地区经济水平产生有利影响,有助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因此,本文认为有理由相信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模型和方法具有高度的适用性。

表 11 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效应的自选择效应处理结果

变量	(1)	(2)
	<i>countyincome</i>	<i>countyincome</i>
<i>num</i>	914.005*** (11.558)	1045.991*** (11.840)
是否是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i>num</i>	-877.759*** (44.252)	-860.578*** (82.506)
常数项	3312.151*** (27.444)	3569.938*** (64.724)
Select		
<i>lnsecondadd</i>	0.005 (0.008)	-0.003 (0.021)
<i>lnpercapitagdp</i>	-0.226*** (0.012)	0.065*** (0.028)
<i>lnarea</i>	0.022*** (0.005)	-0.047*** (0.010)
<i>lnstudent</i>	0.112*** (0.009)	0.540*** (0.022)
<i>lnfci</i>	-0.093*** (0.006)	0.108*** (0.013)
<i>lnbn</i>	-0.179*** (0.009)	-0.643*** (0.021)
<i>num</i>	0.201*** (0.003)	-0.010** (0.005)
是否是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 <i>num</i>	-0.202*** (0.011)	-0.023* (0.013)
常数项	3.414*** (0.112)	-1.746*** (0.246)
<i>athrho</i>	2.846*** (0.035)	
<i>lnsigma</i>	8.237*** (0.005)	
<i>lambda</i>		2335.009*** (166.763)
样本量	25473	25473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表 12 以“rank”为因变量的再检验

变量	(1)	(2)
	<i>rank</i>	<i>rank</i>
<i>num</i>	12.039*** (0.617)	4.323*** (0.324)
常数项	895.669*** (4.521)	-5967.318*** (59.155)
样本量	34750	25473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用	是	是
控制变量	无	有
adj. R^2	0.044	0.822

注:*表示 10% 水平上显著,**表示 5% 水平上显著,***表示 1%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表示系数标准误。

七、结论及启示

本文试图从小额贷款公司角度切入来回答小额信贷是否可以科学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创业从而推动共同富裕。根据上述的实证结果分析,得到了一个可信的解释。从农民收入角度出发,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县域农民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并在考虑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下仍能得到相同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条件或无条件为农户提供贷款,从而提高县域农民纯收入;同时,小额贷款公司越多,越有利于降低成为贫困县的概率,在考虑区域异质性的情况下仍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表明小额信贷能够缓减贫困,有助于脱贫攻坚,促进共同富裕。从家庭收入角度出发,小额贷款公司与家庭土地出租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小额信贷可能通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从而提高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从增进创业的角度出发,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新创企业数量成正相关关系,表明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为创业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从而直接或间接激发创业,有助于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推动共同富裕。

针对上述结论,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需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提高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可及性。减少甚至消除金融排斥,让更多的农民、农村家庭可以享受到小额信贷服务,增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增加财富的积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鼓励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农村金融,助力实现小额信贷办理零手续、无预约、不排队。支持金融监管措施进一步优化调整,让小额贷款公司能够保证生存的条件下满

足监管指标的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普惠性,同时,加强追踪小额信贷的流向,降低不良贷款利率,从而可持续地发展农村金融服务。

二是,普及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尤其是与小额信贷相关的知识,通过提高个人金融素养,促使贫困农民、低收入农户、农村家庭有效利用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从中获益。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协同银行定期在农村开展小额信贷宣传活动,激发农民、农村家庭对小额信贷的需求,使农民更加积极地接受服务。拓宽普及村民金融知识的渠道,降低小额信贷业务开拓难度,更加高效地助力解决“三农”问题,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是,加大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力度,完善中小企业的小额信贷支持政策,为创业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本文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对创业活动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方面,加大小额信贷对创业者、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直接贷款的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另一方面,加大中小企业中初代员工的贷款支持力度,激发更多创业者参与创业,从而间接促进创业。此外,小额贷款公司树立优良的公司信誉,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和中小企业相互信任、互惠共赢。

四是,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制定区域协调、风险可控的普惠金融支持策略,以适应不同地区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中,东部地区的小额信贷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同时东部地区由于小额信贷业务的营利性,存在更高的致贫可能性。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发挥小额贷款的普惠性功能;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力度,缓减由于小额信贷营利性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小额信贷的优势比劣势更加凸显,因此可以实施较为宽松的监管措施,大力支持小额信贷业务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刚, 2015. 金融如何促进创业: 规模扩张还是主体多样[J]. 金融经济研究, 30(5): 29-42.
- [2] 陈宗胜, 2018.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通论由贫穷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与经验三论发展与改革中的收入差别变动[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 [3] 程恩富, 张建刚, 2013.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J]. 求是学刊, 40(1): 62-67.
- [4] 董丽霞, 2022.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J]. 技术经济, 41(12): 111-122.
- [5] 董晓林, 徐虹, 2012.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 金融研究, (9): 115-126.
- [6] 黄祖辉, 杜语, 2022.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6): 87-99.
- [7] 蒋永穆, 谢强, 2021.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4): 15-24.
- [8] 李德山, 赵云佳, 苟晨阳, 2021. 普惠金融对不同群体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调查数据[J]. 技术经济, 40(8): 97-106.
- [9] 李晗, 陆迁, 2022. 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家庭发展韧性——来自中国低保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10): 82-101.
- [10] 李建军, 韩珣, 2019.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 金融研究, (3): 129-148.
- [11] 李建军, 李俊成, 2020. 普惠金融与创业: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J]. 金融研究, (1): 69-87.
- [12] 李建军, 彭俞超, 马思超, 2020. 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 多维度内涵与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55(4): 37-52.
- [13] 李实, 陈基平, 滕阳川, 2021. 共同富裕路上的乡村振兴: 问题、挑战与建议[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9(3): 37-46.
- [14] 刘凤义, 2016. 中国经济学如何研究共享发展[J]. 改革, (8): 146-158.
- [15] 刘桂平, 2021. 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几个问题[J]. 中国金融, (16): 9-12.
- [16]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2021.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37(8): 117-129.
- [17] 马俊, 2022.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J]. 技术经济, 41(7): 1-12.
- [18] 缪建文, 2018. 浅析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J]. 全国流通经济, (2): 52-53.
- [19] 孙芳城, 伍桂林, 蒋水全, 2022.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J]. 技术经济, 41(12): 38-49.
- [20] 卫兴华, 张宇, 2013. 关于坚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对话——兼析效率与公平关系上的不同观点[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6): 1-6.
- [21] 魏杰, 施成杰, 2014. 民营经济共同富裕的逻辑统一[J]. 经济问题探索, (6): 1-8.
- [22] 解垠, 2017. 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及贫困的影响研究[J]. 经济研究, 52(9): 103-116.

- [23] 杨春学, 朱玲, 2014. 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M].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4] 尹志超, 张栋浩, 2020. 金融普惠、家庭贫困及脆弱性[J]. 经济学(季刊), (5): 153-172.
- [25] 张号栋, 尹志超, 彭嫦燕, 2017.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城镇居民失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 61-71.
- [26] 张龙耀, 杨骏, 程恩江, 2016. 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J]. 金融研究, (6): 142-158.
- [27]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2019.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54(8): 71-86.
- [28] 周雪松, 2021-08-25(4).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N]. 中国经济时报.
- [29] 朱玲, 何伟, 2022. 脱贫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J]. 经济研究, 57(3): 25-48.
- [30] ALLEN F, DEMIRGUC-KUNT A, KLAPPER L, et al, 2016. The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Understanding ownership and use of formal accou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7): 1-30.
- [31] ARORA R, 2012.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developing Asia: The Australian connection[J]. Third World Quarterly, 33(1): 179-199.
- [32] BALBONI C, BANDIERA O, BURGESS R, et al, 2022. Why do people stay poor?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7(2): 785-844.
- [33] BECK T, DEMIRGUC-KUNT A, PERIA M, 2007.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5(1): 234-266.
- [34] BECK T, LEVINE R, LOAYZA N, 2000.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1): 261-300.
- [35] BURGESS R, PANDE R, 2005.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 780-795.
- [36] CLAESSENS S, PEROTTI E, 2007. Finance and inequality: Channels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5(4): 748-773.
- [37] KESWELL M, CARTER M R, 2014. Poverty and land redistribution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10): 250-261.
- [38] NYKVIST J, 2010. Entrepreneurship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Sweden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1): 23-43.
- [39] SWAMY V, 2014. Financial inclusion, gender dimension and economic impact on poor households[J]. World Development, 56(4): 1-15.
- [40] YARON J, 1994. What makes rural finance institutions successful?[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9): 49-70.
- [41] YUNUS M, 1998. Poverty alleviation: Is economics any help? Lessons from the Grameen Bank experi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2(1): 47-65.

The Research on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Microcredit Development

Cui Qiaolin, Wang Chen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ree Rural Issues” is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ursuit of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microcredit as a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microcredit was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unty farmers’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and city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county farmers’ income, microcredit can increase the net income of county farmers,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overty occurrence, contributing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household income, microcredit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land rental income, indicating that microcredit can increase the operational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erms of city entrepreneurship, microcredit can promote city entrepreneurship, contributing to make solid step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 of microcredit, and als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formulate policies.

Keywords: microcredit; Three Rural Issues; rural 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